

全面抗战时期蒋介石评价的几个问题

陈谦平

【提要】 关于全面抗战时期蒋介石的评价颇为复杂。虽然蒋介石在抗战前期决心很大,但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胜利屈指可数,在英美干预无果的情况下,蒋介石亦期望能同日本达成某种停战协议。不过,蒋介石进行谈判是有底线的,即日本必须尊重中国行政主权及领土完整。蒋介石的反共政策贯穿于抗战始终。他之所以同意实施第二次国共合作,实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苏联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援助以及期待苏联对日本宣战所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作为政治领袖的蒋介石,由于缺乏国际视野,心胸过于狭窄,性格固执狂躁,因此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他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与应付能力。他考虑更多的是国民党一己私利,因而积蓄实力,消极抗日,1944年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场的溃败,使得国际局势朝着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 全面抗战 蒋介石 中共 国际抗战 评价

2021年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九一八事变90周年。从那时起,国难当头,中国各族人民再次面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和屠杀,无数同胞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背井离乡、颠沛流离。随着日本的侵略加剧,东北各族人民同仇敌忾,从江桥抗战到锦州拒敌,无奈蒋介石和张学良奉行不抵抗政策,东北沦陷、热河失守、伪满洲国建立,大好河山,破碎不堪。

1928年济南惨案后,蒋介石即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整体战略有了切身认识。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认为以中国羸弱的国力,根本无法同日本抗衡,于是利用英、美、苏、德等国,试图在国际关系中寻求遏制日本之道。局部抗战时期,他的对日政策迭经变化:从九一八事变时期的“力避扩大”到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的“积极抵抗,预备交涉”;从长城抗战时期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到《塘沽协定》以后的“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再到华北事变以后采取的“决不容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亦决不签订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协议”的政策,并积极进行整军备战。直到此时,他才丢掉对日本的幻想,坚定了“抵抗决无灭亡之理,而且惟有抵抗为图存之道”,“对日只有抵抗到底”的信念。^①

如何评价全面抗战以后的蒋介石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亦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这也是既有的抗日战争和蒋介石研究中,鲜有学者对该时期蒋介石予以全方位评价的主要原因。^② 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要坚持正确方向、把握正确导向,准确把握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主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3年3月20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下同。

^② 学界对于抗战时期蒋介石的一般评价是“表现了比较明显的民族主义思想倾向”,参见张宪文、方庆秋主编《蒋介石全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

流、本质,正确评价重大事件、重要党派、重要人物。”^①

本文试图对全面抗战时期的蒋介石评价问题谈一些粗浅的、不成熟的看法,敬请批评指正。

一、妥协有底线

卢沟桥事变爆发第二天,蒋介石即调集孙连仲、庞炳勋、高桂滋及中央军李仙洲、关麟征等六个师北上,并致电宋哲元,要求第29军“坚持到底,处处固守,时时严防,毫无退让余地”。^②他于7月17日在庐山表明了“任何解决,不能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等四点立场。^③蒋介石最初认为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志在华北局部,而不敢扩大”,“战事最多限于局部”。^④所以,对于日本调集关东军入关,并“威胁冀察脱离中央,以图其扩张伪组织之野心”,他即“派中央军入河北到保定,不惟打击其目前之野心,而且打破其何梅协定也”。^⑤

淞沪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命令第87、第88师对日本驻淞沪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实施主动进攻。淞沪抗战历时91天,国民政府调集了包括30个德械师在内的70万大军抗击日本侵略者,迫使其从华北、东北和日本国内增兵30余万人到淞沪战场,打掉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嚣张气焰。

关于蒋介石发动淞沪抗战的目的,学界众说纷纭。我认为蒋介石的目标主要有二:其一,彰显中国政府和人民抗击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意志与决心;其二,期待能够像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一样,引起英美的同情,并再次出面干预日本的侵略。

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信心满满地认为“在华北有权利之各国,必不能坐视不理。”^⑥他希图运用外交手段,促使英美再度出面调停。由于听说英美已经向日本提出在华北“不扩大之保证”,蒋介石因此决定要在淞沪地区再大打一场,“在和战未决之前,对倭要着,须使国际空气笼罩,使彼有所顾忌,不得不从速撤兵耳”。^⑦面对以汪精卫为首的主和派,他认为“主和意见派应竭力制止”,“时至今日,只有抗战到底之一法”;“除牺牲到底外,再无他路”。他斥责主和之见“书生误国之尤者”。^⑧

不过,国民政府倾其中央军主力发动的淞沪抗战并未达到让英美出面压迫日本停战的目的。淞沪抗战之初,中国空军的炸弹曾数次误落于英法租界和美国舰船,“死伤中外人民三百余人”,^⑨导致英、法、美三国“大不满意,责难备至,对沪战且有干涉之势”。^⑩同时,美国军舰和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Sir Hughe Knatchbull-Hugessen)又遭受日机攻击,但英美的调停却迟迟没有到来。“九国公约会议已消极,恐无结果”。^⑪11月中旬,布鲁塞尔会议无果而终,蒋介石期待英美干预的幻想已经破灭。

上海失守后,国民政府内部对战与和的争论更加激烈。11月5日,蒋介石顶住党内主和派的压

① 习近平《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人民日报》2015年8月1日。

②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4卷上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年印,第76页。

③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4卷上册,第79页。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7月20日。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7月17日“本周反省录”。

⑥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4卷上册,第76页。

⑦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7月24日。

⑧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9月8日、9月9日。

⑨ 《蒋中正电训》,1937年8月16日,台北“国史馆”藏,资料号:002-010300-00003-020。

⑩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8月14日。

⑪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22日。

力,拒绝了陶德曼(Oskar Trautmann)向中方转达的日本议和条件。“老派与文人动摇,主张求和,彼不知此时求和乃为降服,而非和议也”。^①此时蒋介石的抗战意志比较坚定“宁为战败而亡,毋为降敌求存。战败则可转败为胜,降敌则虽存必亡,而且永无复兴自拔之时矣。”^②他亦认识到,“抗战可以鼓励民气,团结内部,控制反动,统一人心,建立新军基础”。^③

在12月28日举行的国防最高会议上,蒋介石表明了继续抗战的决心“决不能屈服于敌人,与之订立各种不堪忍受之条件,以致我国家与民族永远受其束缚,只要我国民政府不签字于任何不平等条约之上,则我随时有收回国土,恢复主权之机也。”^④

尽管蒋介石抗战的决心很大,但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胜利屈指可数。1938年三四月间,李宗仁指挥的临沂阻击战和台儿庄战役取得歼敌万余人的战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为了挽回“皇军”颜面,日本大本营集中八个机械化师团,企图由豫东和皖北平原地区分别切断陇海线和津浦线,合围徐州附近的中国军队主力。1938年5月18日,第五战区部队主力从徐州附近向日军兵力不足的豫、鄂、皖地区成功突围。但是,国民党中央军14个师约15万人在豫东会战中的怯战、怠战和溃败,竟未能全歼孤军渡过黄河的日军第14师团两万余人,使得日军据守兰封、罗王寨等地,切断了陇海线。随着碭山、归德(商丘)的失守,日军兵锋直指开封和郑州,平汉线岌岌可危,蒋介石不得不掘开花园口、赵口附近的黄河大堤,用洪水将日军第14、第16两个师团主力围困在中牟、尉氏、朱仙镇一带。这一举动虽然暂时阻挡了日军由郑州南下进攻武汉的步伐,却也使豫、皖、苏三省数百万民众遭受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从1938年6月开始,日本军部策动了对国民政府的政治诱降,蒋介石亦幻想着能同日本当局达成某种停战协议。在蒋介石与何应钦的同意下,萧振瀛于8月27日在香港同日方代表和知鹰二进行会谈,这就是所谓的“萧振瀛工作”。实际上,萧振瀛工作完全是在蒋介石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⑤

萧振瀛于9月27日向蒋介石报告了与和知鹰二的谈判情况。次日一早,蒋介石即致电萧振瀛,指示其在与日方代表洽商时必须注意的事项:包括“与对方谈话,切不可稍有一点增减,必须依照所面述之范围,万不可有所出入”;“对于无商量余地之事,如彼方再三试探,必须坚强拒绝”;我方“所复具体各件,切不可书面明示彼方,且须对彼言明无具体成文之件携来,一切皆以口头商洽作为临时相商之事”。^⑥这一方面体现了蒋介石对日谈判的谨慎态度,亦显现出他对日本当局的不信任。

当日上午,蒋介石再电萧振瀛,要其向日方代表表明以下各点:1.“原状未复、诚信未孚,即未有以平等待我中国之事实证明以前,决不允商谈任何协定”。无论军事协定或经济协定,均“不得涉及于停战协定之中”。他斥责萧振瀛派人带来的经济协定原稿,“无异亡国条件,更无讨论余地”。2.“停战协定只可订明停战之时间、地点与日本撤兵及恢复七七以前原状之手续与月日,此外不能附有任何其他事项”。3.“停战之日即为停战协定同时发表之日,决不可以停止进攻若干日为签订协定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20日。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2月11日“本周反省录”。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2月13日。

④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4卷上册,第156页。

⑤ 邵铭煌误认为萧振瀛在谈判过程中遵循的都是何应钦的指示,实际上何只是蒋介石的传声筒而已。参见邵铭煌《萧振瀛工作:抗战初期日本以何应钦为对象的谋和触角》,《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3期。

⑥ 《蒋中正电示萧振瀛对日表示原状未复诚信未孚前不谈协定立场并示洽商要项》,1938年9月28日,台北“国史馆”藏,资料号:002-010300-00016-078。

之时间。换言之,中国于停战协定未签订之前,“绝不原状”。4. “原状未复且未有以平等待我之事实证明以前,决不能再提军事协定,且绝无保留之余地。否则,请明告对方无从再约续谈也”。^① 这些条件所透露的信息,是蒋介石在同日本进行谈判中所坚持的底线:日本军队不撤退至卢沟桥事变前之原状,中国的抗战绝不会停止。

后因中国军队的大别山麓阻击战受挫,尤其是信阳失守,武汉大门洞开,加之日军于10月12日在广东大亚湾登陆,蒋介石认为日本的意图在使中国屈服,故于14日电嘱萧振瀛,“敌既在粤登陆,可知其毫无诚意,不可与之多谈”特别指示“关于谅解部分,甲、乙两案应全部作废”。^② 所谓甲案内容,主要是规定萧振瀛在何种情况之下终止谈判,如“十五[日]以前如不能决定实施办法,认为缓兵之计无诚意,故此次所谈者皆作罢论”;“如敌进占……黄安、信阳各地,亦不愿再继续再谈”;“无人敢直接交涉”等三条。所谓乙案系对萧振瀛在谈判中应该掌握的不能突破的原则,如“绝对拒绝之事,宁死勿允”;“自七七以来对于和战之方针与限度,早在去年庐山屡次声明,即和战问题今以恢复七七以前之原状为标准”;“凡将来之事,不可先提限期,自处束缚”;“以十八日为限期,防其缓兵”;“破裂则不怪,越范则不可”;“此次和平,不欲第三者介绍与调停”等七条。^③ 蒋介石特别叮嘱萧振瀛,对于乙案内容,不允许向日方“微露”。^④

在10月15日的晤谈中,和知鹰二向萧振瀛转达了日本方面希望同中国达成的谅解事项。^⑤ 10月18日,蒋介石通过何应钦指示萧振瀛,日方所提“甲、乙、丙、丁各项皆是干涉中国内政范围”,并强调中国“若行政不能独立,无异等于亡国,万不能承认”。他指示萧,如果日方“再提此等事,可知其毫无诚意,不必谈”。同时,蒋介石还告知萧振瀛,“戊项对于中国行政之完整不能尊重,是其居心仍为亡我中国。如其有诚意,则其宣言必须言明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整,决不能将行政二字删而不提也。关于己项中日经济之提携,亦必须在恢复原状后方得商讨”。同时,蒋介石以日军“侵粤以后内外情势大变,决不容有从容商酌余暇”为由,电令萧振瀛以10月20日为期限,“过此即作罢论”。^⑥ 在蒋介石的命令下,萧振瀛工作实际上已于10月18日终止。

与此同时,蒋介石亦命令孔祥熙方面停止向日方的交涉,除非“近卫果有诚意,能与兄谋晤,此事当可考虑”。他告诉孔祥熙,“吾人必须先具有不惜牺牲一切之决心,然后方有和平之望。至于武汉之得失,实无关于军事之胜负。只要我有实力,能继续抗战,则敌终不能不向我求和。”^⑦

可见,在抗战防御阶段,面对日本不断的政治诱降,蒋介石采取的是有底线的谈判政策,即日本

① 《蒋中正电示萧振瀛对日表明原状未复诚信未孚前不商谈任何协定立场》,1938年9月28日,台北“国史馆”藏,资料号:002-010300-00016-080。

② 《蒋中正电嘱萧振瀛甲乙二案应全部作废》,1938年10月14日,台北“国史馆”藏,资料号:002-010300-00017-024。

③ 《蒋中正致萧振瀛电 附前案甲乙二案之内容》,1938年10月14日,台北“国史馆”藏,资料号:002-010300-00017-025。

④ 《蒋中正电嘱萧振瀛甲乙二案应全部作废》,1938年10月14日,台北“国史馆”藏,资料号:002-010300-00017-024。

⑤ 日本提出的谅解事项如下:“甲、防共军事协作及驻兵。如果中国实行反共,则秘密约定亦可;所谓驻兵,指将来对内外蒙边防,双方军事布置之意。乙、中国政府之调整。中国政府酌令接近日本之人员参加,以促进两国亲善关系,则国民党问题,即可不提。丙、两伪组织之收容。伪组织取消后,对主要人物酌予安置。丁、满洲国之承认。此问题暂可不谈,待合作二三年后再商解决。戊、中国领土主权行政之完整。己、日华满经济提携,满字可不涉及。庚、战费互不赔偿。戊庚两项则照原文。”《萧振瀛致何应钦铣辰电》(1938年10月16日)转引自邵铭煌《萧振瀛工作:抗战初期日本以何应钦为对象的谋和触角》,《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3期。

⑥ 《蒋中正电复萧振瀛日军侵粤后内外情势大变决不容有商谈余地》,1938年10月18日,台北“国史馆”藏,资料号:002-010300-00017-030。

⑦ 《蒋中正电示孔祥熙武汉失守后继续抗战决心》,1938年10月18日,台北“国史馆”藏,资料号:002-010300-00017-029。

必须尊重中国的行政主权及领土完整;日方必须停战、撤兵,必须恢复到七七事变以前状态;日本必须自动取消“满洲国”等,这些条件意在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完整和不受侵犯,因此,不能将蒋介石的妥协让步同汪精卫等的卖国投降混为一谈。当然,蒋介石对于同日本达成妥协的顾虑很多:一是怕停战后日本“不撤兵或不缴还华北”;二是怕中共的抵制与反对,“不从命令”;三是顾忌“英、美不悦”。^①

二、抗战期间蒋介石的限共、防共与溶共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对中共政策发生重大转变。1937年1月,刚刚回到南京的蒋介石即制定“和俄制共”政策,而就在一年前,他的政策还是“和倭清共”。^②何为“制共”?即“剿抚兼施,期易肃清”,并将之列为1937年对内方针第一条。^③他最初规定共产党“不许宣传赤化,并用兵力防制之”,^④后来又稍加松动,即“共党应与之出路,以相当条件收容之,但令其严守范围”。^⑤

1月底,周恩来向顾祝同提出国共在潼关举行谈判,蒋介石闻讯立即电告顾祝同,同意陕北红军“由中央指定驻军区域”,“每月接济二十至三十万”。^⑥周恩来同顾祝同、张冲的谈判于2月11日开始,至3月8日,双方意见趋于一致,由周恩来起草总结共计三项15条,并送蒋介石定夺。在政治问题上,中共“承认服从三民主义的国家及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其制度……改为陕甘宁行政区”;“红军取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中央军事委员会及蒋委员长之统一指挥”;并要求参加国民大会和国防会议。在红军改编问题上,中共要求将“现有红军中之最精壮者”编为“3个国防师,计6旅12个步兵团”,并设“某路军总指挥部”,经费、补给“照国军同样待遇”。^⑦

3月26日,蒋介石在杭州同周恩来进行了会谈。蒋介石承认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他要中共承认他的领袖地位,希望中共“要能与他永久合作”。同时,蒋介石同意中共军队设立“总的司令部”,并称“决不来破坏”中共军队。^⑧不过,当蒋介石于4月15日看到中共中央在向广大党员解释“本党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四项保证’,决不能解释为所谓‘共产党的投降’”,而是“一种让步”时,^⑨他的态度又发生变化。他在5月17日制定的“对共党办法”中明确规定“甲、取消名义与改组。乙、暂行三民主义。丙、领袖地位与权责。丁、军队改为国军。”5月25日,又增加了“甲、宽给其经济。乙、严限其军额。丙、政治从宽。丁、区域宜严,不能使之独立”等内容。^⑩

后来,他甚至提出中国共产党“改党名,誓行三民主义”的要求。最初的提议是“组织国民革命会”,并称“共党已有取消党名之表示”。^⑪6月8日至15日,他同周恩来在庐山的谈判中,拿出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方案,试图将同盟会“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之党”,并“可与第三国际发生代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9月27日。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月“本年政策·乙”。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月“民国二十六年大事表·廿二”。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月5日。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月“本年对内方针一”。

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56页。

⑦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95—196页。

⑧ 《中央关于同蒋介石谈判经过和我党对各方策略方针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80—181页。

⑨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195页。

⑩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5月17日、5月25日。

⑪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5月31日“本月反省录”。

替共党关系,并由此坚定联俄政策”。^① 蒋介石试图通过国民革命同盟会来限制中国共产党,分化中国共产党。此外,在这一时期的蒋介石日记中,充斥着“共党首要应离军区或出洋”“毛泽东出洋”;“民族统一纲领与联盟组织之不当”;对共产党要“严厉监督”“共党宣言中应停止活动”;“陕北政治”由“中央统一”;“军额与特区问题”等内容。^② 国共谈判一度陷入僵局。

全面抗战爆发后,尤其是八一三淞沪会战,使蒋介石工作重心放到抗日战事上来。此时苏联主动向国民政府提供一亿美元的武器订单,使蒋介石认识到“对共党之收编应即解决”。^③ 8月1日,蒋介石电嘱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转告周恩来,“约同朱[德]、毛[泽东]诸先生即来京面商大计”。^④ 8月8日,蒋介石再命钱大钧电询蒋鼎文,“陕北部队究竟何时可出发?毛[泽东]等来否?”^⑤ 8月18日,蒋介石批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又改为第18集团军。10月12日,蒋介石同意南方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此外,蒋介石对中共中央于7月上旬就已提交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准予发表”。^⑥ 蒋介石对于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的动向十分关心,如8月19日就要求蒋鼎文速报“朱德部行动与运输日期计划”。^⑦ 在忻口作战期间,担任敌后作战任务的第18集团军连克平型关、涞源、紫荆关、团城口、广灵等地,切断雁门关日军补给,受到蒋介石的赞赏,认为“八路军已发挥机动效能”。^⑧ 太原失陷以后,退往晋南的中国各部队“无人总其成”,在听到美国武官报告了八路军作战经过后,“决派朱德指挥”。^⑨ 3月11日,蒋介石致电驻防晋南的第35军团军团长曾万钟、第14军军长李默庵和第17军军长高桂滋等“此时晋南各军急应规定整个统[通]盘计划与各部分任务及地区。于卫俊如[立煌]未到以前,望兄等皆受朱德总司令之指挥,务希和衷共济,使各部行动有整个计划。”^⑩ 同日,蒋介石令何应钦“先发陕北善后费五万元,其余陆续再发”。^⑪ 他在当时的日记里有“第八路军亦能听命也”的记载。^⑫ 1938年8月3日,蒋介石为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贾拓夫及李初黎、冯文彬三人失踪事件,致电陕西省主席蒋鼎文查问“实情如何”?指示其“对共党方针,应以公正处之,勿使其越轨”。他告诉蒋鼎文,“该三人如由政府逮捕,则可准其保释。当此时期,勿使有所藉口也”。^⑬

不过,“对共党之预防”仍贯穿于抗战始终,这亦是在全面抗战期间蒋介石日记中最常见的六个字。蒋介石之所以同意实施第二次国共合作,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苏联和中共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全面抗战爆发后,苏联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援助以及蒋介石期待着苏联对日本宣战所致。1937年底,蒋介石制定的“对共党方针”即在“放任乎?统制乎?保守乎”中犹豫不决,

①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周恩来同志第二次与蒋介石在庐山谈判结果致国际书记处电》(1937年6月17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第225页。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6月7日、6月8日、6月17日。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7月19日。

④ 《蒋中正致蒋鼎文电》,1937年8月1日,台北“国史馆”藏,资料号:002-010300-00002-001。

⑤ 《蒋中正致钱大钧手令》,1937年8月8日,台北“国史馆”藏,资料号:002-010300-00002-071。

⑥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9月19日。

⑦ 《蒋中正致蒋鼎文电》,1937年8月19日,台北“国史馆”藏,资料号:002-010300-00003-040。

⑧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参考资料》(1),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56页。

⑨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3月9日、3月10日。

⑩ 《蒋中正致曾万钟、李默庵等电》,1938年3月11日,台北“国史馆”藏,资料号:002-010300-00010-033。

⑪ 《蒋中正致何应钦电》,1938年3月11日,台北“国史馆”藏,资料号:002-010300-00010-034。

⑫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0月24日。

⑬ 《蒋中正致蒋鼎文电》,1938年8月3日,台北“国史馆”藏,资料号:002-010300-00015-007。

并决意先“应暂使能与共党合作者共同抗倭,似为相宜”。^①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立即认为“目前急患不在敌寇,而在……共党到处发展”。^②在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谈及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时,蒋介石强调,“要以严正的态度教训之、领导之、约束之”,“我们的方针是要中共融合于本党之内”。^③国民党对中共的防范和限制更加系统化,在制定并发布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防止异党兵运方案》《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一系列秘密文件后,蒋介石已经决心采取“联俄不容共”的政策。自此,国共在山西、河北、山东、江苏发生了一系列军事冲突。蒋介石决定“中共不能参加中央政权,中央不承认中共法律地位”,^④同时积极部署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事行动。

1940年12月10日,蒋介石密令顾祝同“按照前定计划”,对在安徽泾县一带的新四军军部及其直属部队“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⑤从1941年1月1日至6日,他几乎每天与国民党政要商谈“对中共新四军等策略”。^⑥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认为“江南新四军既已与我发生冲突,自当积极肃清”不过,他亦认为“以现势观察,中共决不敢在此时有所叛乱也”。^⑦对于白崇禧等“坚欲在此时整个消灭共党”的建议,他斥之为“不识大体与环境之谈,明知其不可能而强行之”,并称在皖南同“新四军冲突实违反我意旨”。^⑧

实际上,由于担心苏联政府的态度以及英美等国际舆论的影响,蒋介石并不敢同中共彻底“决裂”。皖南事变发生时,苏联援助国民政府的200门大炮和250架飞机刚刚运抵新疆“俄使奉其政府令来询问新四军案,并问为何顾长官派兵包围新四军行动”。^⑨而英美驻重庆大使亦对蒋介石表达各国政府的不满。因此,尽管蒋介石于1月30日以“抗命叛变”为名,发布撤销新四军番号的通令,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奉令在随后颁发的宣传要点中,强调皖南事变“乃纯粹军纪问题,绝不含政治的或党派斗争的意义”;“各言论机关,如有评述,应以新四军为范围予以评述,对中共及十八集团军可勿涉及”。^⑩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问题一直是蒋介石的心腹大患。

早在1940年9月19日,他就在日记里写道“我惟有整补兵力,不再作无益之消耗,一面专心经营川、黔、滇、康之政治经济,巩固革命基础,如此只要中央实力不损,根据地加强,则对内对外皆有恃无恐,中共虽叛乱或扩张其势力,亦不足虑也。”^⑪可见,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后期消极抗战的战略在此时已经确定。

盛世才投靠国民党后,蒋介石于1942年8月20日致函盛世才,拟定在新疆的对苏、对共方针计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2月10日。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9年1月6日。

③ 张世瑛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2册(补编),台北“国史馆”2015年版,第168—170页。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10月11日。

⑤ 《蒋介石密令顾祝同“解决”江南新四军电》(1940年12月1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政治(2),凤凰出版社1998年版,第427—428页。

⑥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1年1月3日。

⑦ 蔡盛琦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5册,台北“国史馆”2010年版,第227页。

⑧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1年1月13日。

⑨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1年1月25日。

⑩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政治(2),第552页。

⑪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10月1日“本月大事预定表”。

10条,其第三条即是“肃清新疆共党”。^①8月29日,蒋介石派宋美龄携函飞往迪化,督促盛氏反共。^②9月17日,盛世才逮捕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陈潭秋,以及毛泽民、林基路等20多名在新疆任职的中共干部,并于次年9月27日将陈、毛、林三人杀害。^③

1945年8月10日,日本战败的喜讯传来,蒋介石目睹了重庆军民狂欢庆祝抗战胜利的热烈场面,但他的心情却愈加沉重,快乐不起来。“自星五夕接得日本投降之报后,自知困难更多,责任尤重……毫无快乐之感,而共匪各种叛变与胁迫之言行,虽至不堪忍受者,则惟有置之一笑”。他认为,“接收敌伪投降最重要之关键”在于阻止中共部队受降,“若稍失当,则共匪即可与之勾结一气,演成极大之动乱也”。当日下午,他手拟各类人事令稿“约卅余通,煞费苦心”,^④其中包括次日发给朱德的“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勿再擅自移动”。^⑤

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于抗战后期积蓄实力,消极抗日,战后更是无视中国各党各派和各族人民的和平建国愿望,悍然发动以剿灭中国共产党为目标的内战,这必然给战后中国的民族复兴大业带来巨大伤害。

三、中国之“命运”:缺乏国际视野的蒋介石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美英对日本宣战,中国战场的局面一片大好。首先是中国与国际反法西斯国家结盟,蒋介石于1942年1月2日就任包括安南和泰国在内的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其次是美国提供了五亿美元的贷款,数量巨大的美国军援开始进入中国。第三是为维护滇缅国际交通线,蒋介石于2月派遣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第五军在同古、仁安羌等战役中均打出中国军队的士气与威名。此外,从1941年底起,中国军队先后在日军发动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和常德会战中给侵华日军以重创。更重要的是,1942年10月10日,美英两国政府分别宣布将与中国政府缔结新的平等条约;1943年10月30日,中国代表在莫斯科召开的四强宣言上签字,奠定了中国的战胜国地位。

1943年11月23日至26日,蒋介石应邀赴开罗参加美、英、中三国首脑会议。期间,罗斯福和蒋介石的四次会谈,奠定了日本无条件投降时应接受的条款(包括日本将窃取中国的领土,如东北三省、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和战后亚太国际秩序的基础。开罗会议可以说是蒋介石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刻。“东三省与台湾、澎湖岛……能获得美、英共同声明,归还我国……实为中外古今所未曾有之外交成功也”。^⑥不过,由于在随后举行的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得到了斯大林在欧战结束后半年内参加对日作战的承诺,中国战场的地位遂开始下降。正如吴相湘指出的那样,“开罗会议是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中美关系到达抛物线上的顶峰,也是下降的开始”。^⑦

1944年4月,日军发动一号作战,仅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就击溃了河南省内的40万中国军队,占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8月20日;周美华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1册,台北“国史馆”2011年版,第77页。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8月29日。

③ 参见陈慧生、陈超《民国新疆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7页。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8月12日。

⑤ 王正华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2册,台北“国史馆”2011年版,第83页。

⑥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11月28日“上星期反省录”。

⑦ 吴相湘编著《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930页。

领郑州和洛阳,打通平汉铁路。6月18日,长沙被日军攻占,战略重镇衡阳危在旦夕。美国政府对中国军队的溃败十分不满。7月7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对华中战局表示忧虑,认为必须迅速采取紧急措施,即由史迪威统率“包括共产党军队在内”的“全部华军及美军,并予以全部责任与权力,以调节与指挥作战,用以抵抗敌人之进占”。^①7月10日,蒋介石通过孔祥熙转告罗斯福“以物资支配权完全集中于史个人,而我政府不能预问,以及包括共产党在内二点,关系于合作前途最为重要,若不改正其观念,则必引起全国军民不良之反响,更使史迪威将来不能与中国军队之合作。”^②

7月22日,美军观察组赴延安访问,此举得到史迪威大力支持,从而激化了蒋史矛盾。23日,蒋介石命令孔祥熙向罗斯福转达任命史迪威统率中国军队的三个条件:1. 共产党军队能否在统率之列,“当视该军以后能否即时接受中央政府之军令与政令而定”;2. 在授予史迪威职权之前,必须确定其职权名称以及同蒋介石的关系;3. 租借法案物资的支配权应“完全归于中国政府或最高统帅”。^③王世杰则建议蒋介石“赞同罗斯福统一中美作战军队的指挥之议”,他认为“美国将领任此指挥之职,或可间接减少苏联加入远东战事后之困难”。^④

8月间,中国战场局势进一步恶化。衡阳于8月7日失陷,日军沿湘桂铁路向广西进犯。8月23日,罗斯福急电蒋介石,要求他“对于史迪威将军在阁下指挥之下实行指挥中国部队一事,尽最早可能时间作必需之措置”,同时再次表明了动员中共部队参加进攻的态度。^⑤蒋介石为此倍感压力,“内共外美之压迫威胁日甚一日,革命形势至今恶劣已极,实为万料所不及也”。^⑥经过多日考虑,他决定对美外交方针采用“逆来顺受之道……接受其有限度之要求”。^⑦

9月6日,美国特使赫尔利(Patrick Hurley)由印度飞抵重庆,史迪威同机到达。围绕史迪威的指挥权问题,中美双方进行了一系列秘密会谈,但广西战局的恶化,使得蒋史关系进一步恶化。9月15日,蒋介石将史迪威由昆明召回,要求他立即率领中国驻印军进攻八莫,如一星期内不见行动,就要将远征军撤回怒江东岸。^⑧史迪威断然拒绝该项命令,并向美国政府报告了蒋介石的这一举动。

罗斯福接报后,于9月18日向蒋介石发出一份措辞严厉的电报,警告蒋介石若“不立即补充缅甸北部部队,或不立即派遣生力军协助在怒江方面之华军,则吾人将完全消失开放接济中国陆路路线之机会,而且直接危害现有之空运途径”,届时蒋介石必须对此“负完全之责任”。^⑨当晚,蒋介石召见赫尔利,要求美国立即召回史迪威,并称“史迪威在华一日,中美商谈一日不能进展”。^⑩赫尔利也向罗斯福施加压力,他于10月10日致函罗斯福,“如果你在这场争论中维护史迪威,你将失去蒋介石,并且你还会连同失去中国……如果我们不能让中国军队继续参战……美国势必在中国遭到失败”。^⑪罗斯福在权衡利弊后,决定向蒋介石妥协。10月19日,他致电蒋介石,同意将史迪威召回,并由魏德迈(Albert

①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3),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634—635页。

②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3),第638页。

③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3),第646页。

④ 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版,第623页。

⑤ 叶惠芬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8册,台北“国史馆”2011年版,第180—182页。

⑥ 叶惠芬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8册,第187页。

⑦ 叶惠芬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8册,第200—201页。

⑧ 叶惠芬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8册,第354页。

⑨ 叶惠芬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8册,第423—424页。

⑩ 吴相湘编著《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1044页。

⑪ 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郭济祖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72页。

C. Wedemeyer) 继任。

史迪威事件爆发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开罗会议后美国轻视中国战场而导致蒋介石的不满,史迪威实际上成为中美战略矛盾与冲突的牺牲品。一方面由于苏联在德黑兰会议上允诺欧战结束后半年内参加对日作战,另一方面则是美国军方认为对日作战的主战场在太平洋,中国战场的地位因而大大下降。随着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上的胜利和中国军队在豫湘桂作战中的溃败,美国军方更加看轻中国战场未来的军事价值。马歇尔于1944年5月27日电告史迪威“阁下赴华之主要任务……已有变更,即今后中国战场之作战工作,均以支援太平洋与西太平洋作战为主,击败日本,最好勿在中国大陆苦战。”^①史迪威事件使中美关系出现严重危机,尽管美国政府屈从了蒋介石的意愿而将史迪威解职,但对于美国来说,中国战场的军事价值已经基本丧失。

1944年以后的东方战局深受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影响。这一时期,中美之间的矛盾已经加深,美国政府对国民政府在豫湘桂战场的溃退极度不满;同时亦要求蒋介石结束一党独裁统治,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由于认识到日本战败已成定局,蒋介石此时更多考虑的是战后中国政治格局。遏制苏联和防止中国共产党的崛起已经成为蒋介石战后政略的主要目标。美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的首要目标是要扶助一个统一、强大并对美国友好的中国,使其成为战后遏制苏联和日本的力量。但是,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的败退,使得美国政府看轻国民政府军队的抗战能力;而蒋介石则幻想美国加大对华援助,甚至试图依靠同美、英军队的合作来击败日本。

为了避免美军在东方战场的巨大牺牲,从1944年下半年起,美国政府一直在说服苏联对日宣战,但也意识到苏联出兵中国会对战后美国控制东亚带来不利影响,尤其是担忧苏联利用中共及其军队控制东北、华北和西北广大地区。1945年2月,美、苏、英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举行会议。会上,美、英两国首脑同意了苏联提出的参战条件,并于1945年2月11日由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联名签署了《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之协定》(即《雅尔塔密约》)。这份协定是瞒着中国政府私下订立的,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了破坏与蹂躏。《雅尔塔密约》的签订使战后东亚国际新秩序中加入了苏联的因素,这是蒋介石始料不及的,中国命运遂发生新的变化。

总之,在全面抗战时期,作为政治领袖的蒋介石,缺乏国际视野,心胸过于狭窄,性格固执狂躁,疑神疑鬼。这些致命的弱点,使其在抗日战争后期,尤其是1944年以后,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特别是中、美、苏关系时,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与应对能力。蒋介石考虑更多的是战后国民党的一己私利,而没有以民族的和解、国家的复兴为出发点。他拒绝中共和民主党派建立一个多党派联合政府的主张,这是因为遏制苏联和消灭中共已成为他战后政略的核心。

(作者陈谦平,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特聘教授;邮编:210023)

(责任编辑:敖凯)

(责任校对:徐志民)

^① 梁敬錡《开罗会议》,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20页。

evolved into two research positions ,to “reevaluate historical data” and to “reframe historiography”. The former position promoted the compilations and publications of the general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and the latter one fostered the birth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s an independent subdiscipline of scholarly inquiry. Early pioneers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ical studies ,such as Liang Qichao ,Zhu Xizu , firstly reexamined the general framework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ography. Following them ,Yao Mingda ,Meng Wentong , Jin Yufu , and others explored the methods of studying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detail. Among the later generation , Meng Wentong is an outstanding example. The early research paradigm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developed between Confucian classical hermeneutics and historical inquires. Scholars represented by Liang Qichao furthered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ography in focusing on its three elements: the historiographer , the historical work ,and the historian. Meng Wentong ,by contrast ,highlighted the concepts , such as Confucian classics and moral principles in Chinese intellectual tradition. He established a unique writing model for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that consciously served as an alternative to the model promoted by Liang Qichao and the others. To further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 we should learn from the writings of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ers exemplified by Meng Wentong.

A Historical Evaluation of Chiang Kai-shek’s Role During the Comprehensive Anti-Japanese War //
Chen Qianping

The evaluation of Chiang Kai-shek during the Comprehensive Anti-Japanese War is quite complicated. Though he showed abundant determination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the GMD army only had few victories on the battle field. As the chance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interventions diminished , Chiang hoped to reach a tentative truce with Japan. However , the negotiations initiated by him had a bottom line , that is , Japan must unequivocally respect China’s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Chiang followed his anti-communist policy throughout the War of Resistance. He agreed to a second cooperation with the Communist Party for several reasons including the Peace Agreement of the Xi’an Incident , the assurance of military assistance from the Soviet Union to his Nationalist Government , and the high expectation that the Soviet Union would declare war on Japan.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Pacific War , Chiang , though as a nationalist political leader , was short of a global vision for world politics. He was arrogant , tenacious on power , and overtly testy. He did not have the wisdom and good judgment to deal with wartime politics. He often prioritized his party’s interests , held back GMD forces , and chose a strategy focused on de-escalation on the battle field. The GMD army’s loss during the Operation Ichi-Go in 1944 was a turning point for the decline of China’s posi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Writing National History by Ancient Historians in Vietnam // *Cheng Sijia*

The ancient history of Vietnam offers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origins of the Vietnamese people and the country itself , which is the reason that it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scholars who study the country. In the past , due to the lack and limitation of historical data , scholars from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mainly focused on the verification discussing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history of ancient Vietnam ,and few scholars had paid attention to the holistic process in which historians of ancient Vietnam wrote and constructed the history. This article , based on the newly found text *Dai Viet Su Luoc* as well as other